



大家

我在山东大学的这些年

1

按照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规定,2009年,我63岁,学校人事处通知我办了退休手续,但仍然返聘,如常上课。又因为我曾有幸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高校名师”奖,全校也就八九位“名师”,规定可以继续招收博士生。可是我不想再“挤占”中文系的资源,返聘两年,就想彻底退下来,点东西好了。何况当时的系领导也并无挽留的意思。不料此时山东大学就“盯”上了我,托人来打听,说打算设立“人文社科一级教授”,问我是否可以考虑应聘。记得当时我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山大原党委书记曾繁仁先生和在任校长徐显明先生约见我面,他们的诚恳让我感动。2011年7月,我到徐州开会,会后顺便去了趟济南。山大文学院院长郑春热情接待了我,还安排我和妻子商量,觉得身体还行,而山大又是很不错的大学,在那边图个安静,再干几年也未尝不可,便决定应承山大的邀请。2011年9月初,我和妻子便来到山东大学。

我们打算就住在济南,把十多箱书也带去了。学校安排我们入住南院“院士楼”。房子是新装修的,家具一应俱全,办公室主任沈文细致入微地安排我们的生活。南院是山大教师的老宿舍区。这里还有当年专门给成仿吾先生建的“校长楼”,可惜他没有住过,改为俱乐部了。虽然是老旧小区,生活却很方便,上课步行去学校也就过了一条马路,走十多分钟。

2

我的家还没有安下,就给本科生上课了。是讲“现代文学作家专题研究”,属于选修课。这是我为山大做的第一个工作。

大概因为好奇,岁数不小了,还给本科生开课,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有一百多人,很快,这就成为新闻,当地报纸报道了温儒敏受聘山大,给本科生开课的消息。之后又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一时间,学界都在传播这个消息。我甚至还被山大评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回想起,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之所以引起一些关注,一是借所谓“北大中文系主任受聘山大”吸引眼球,而非我本人有什么“能耐”;二是老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可能比较少,借此说明山大还是重视本科教育的。

不过我的课也的确上得比较认真,也比较活。我一般不做满堂灌,而要求学生先看作品,然后在课上引出一些有趣又有料的问题,当场组织讨论。比如,为何文学史对郭沫若评价很高,而一般读者却不好看?《雷雨》的主角到底是谁?《边城》的情节很简单,靠什么吸引人?等等,几乎每次课都有一个问题,在讨论中引出阅读与评论的方法,学会观察文学现象。这样授课,是在传递方法性知识,授人以渔,学生感觉有些趣味,也就愿意多读写作品了。

山大的本科生都是高分考进的,比较聪明好学,也比较踏实,和我配合很好,我也比较悉心指导。给他们修改小论文,对每一篇都有针对性地写上批语,提出进一步学习的建议。这个课我在山大上过四轮,后来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就是在讲课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我在山大还讲过另一门课,是《文论精读》,原来在北大也开过的,主要是博士生的讨论课。内容是选择十多篇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而在研究角度与方法上具有一定典范性的论文,加上若干篇可能有“典型”毛病的博士论文,让学生先阅读思考。然后分工,每位同学负责讲析其中一两篇论文之得失,大家讨论,我最后点拨分析。开这门课是为了打开思路,所谓“观千剑而识器”,学习论文写作的规范与变通。这门课也开设过三轮,学生反映这门课很实用,对他们进入论文写

跋履

阳光花瓣

□ 韩浩月

夏天爬山,整条山道上方搭好了遮阳架,上面爬满了藤本植物,枝条与叶子密密麻麻,在高于36摄氏度的气温下,走在这样的山道上,哪怕没有习习凉风吹着,也不至于热到哪里去,几百米的山,轻松就爬到了顶。

下山的时候,眼前有忽然一花的感觉,出现在眼睛里的景象,有点让人不敢相信,揉了揉眼,再仔细看,还是不敢相信——道路上竟然撒了许多的花瓣,而且撒得很均匀,没有一片花瓣,是被另一片花瓣压着的。这是盛夏,按道理早就过了落花季节,而且山里早已绿意浓浓,很少能看见花朵了,这些花瓣究竟是哪里来的?

谜底并不难揭晓,在上上下下看了几眼之后,很容易就得到答案:天空毒辣的阳光,经过一层藤本枝叶的遮挡,从缝隙间落到山道上的碎片化阳光,就成为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花瓣”,山道变成了一条长长的“银幕”,

那些阳光花瓣,是会动的,这又让它们多了些生机,它们还会随着身边掠过的一阵轻风而微动,如果仔细倾听,似乎还能听到它们的欢呼,它们是打算在这山道上赛跑吗?还是调皮地只想躲开游人的脚步?我亲眼看见一片“花瓣”站立了起来,就是那么神奇,它

花瓣是被投射到这块“银幕”上的,其逼真程度,超过4K高清。

我说这些散碎的阳光像花瓣,并非心血来潮、大惊小怪,而是这些落在地上溅起后又平躺的阳光,实在太像花瓣了,不仅有花瓣的形状,还有花瓣的颜色,当然,这颜色并非五彩缤纷,而是只有白色、粉色、黄色,这些颜色都是淡淡的,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这让人饶有兴趣,想去观察阳光花瓣的颜色来源。但大自然很神奇,等人蹲下来、低下头、打算较真的时候,那颜色便调皮地跑了,只剩下白晃晃的花瓣在慵懒地荡漾。

对,那些阳光花瓣,是会动的,这又让它们多了些生机,它们还会随着身边掠过的一阵轻风而微动,如果仔细倾听,似乎还能听到它们的欢呼,它们是打算在这山道上赛跑吗?还是调皮地只想躲开游人的脚步?我亲眼看见一片“花瓣”站立了起来,就是那么神奇,它

作是有帮助的。

我把上课作为我在山大的主业,从2011年讲课,一直讲到2017年。记得最后一次上课是晚上,课后同学们簇拥着把我送回到宾馆学人大厦,很让我不舍。

3

在山大的第二项工作就是指导硕士生与博士生。从2012年开始,到2024年,共指导过7名硕士生,7名博士生,还有1名博士后。到2023年,我考虑年纪大了,向学院说明决定不再招生,现在(2024年)我名下还有两名博士生尚未答辩。博士生一般都是招收进来后由教研室分配导师,博士生则是由学生认定导师后再报考。大概因为我的“名气”比较大,又传说比较严格,每年报考我门下的考生总是很少,我带的博士生多是从其他老师名下转过来的。多数博士生学业基础不是很好,但都比较努力,学风比较扎实,四五年内就有明显进步,最后完成学业,成功答辩。

我指导博士生一般不会带着他们作我的课题研究,而主要看博士生的长处、兴趣和发展的可能性,帮他们找到比较适合的论文题目。他们的题目五花八门,比如研究五四时期翻译(尹辉),研究畅销的通俗刊物(刘启涛)、研究五十年代“人大文学研究班”(杨伟),研究“语文方法性知识”(靳彤)、研究王瑶的文学史思想(刘世浩)、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封面设计(侯淳),研究“胡风派”作家路翎(孙诗源),等等,几乎都是学界少有关注,而又具有学术价值的论题。他们的论文写作都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有的简直是“煎熬”,甚至要放弃了。我说写论文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可能终身受益,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尽力做好。我也会帮助他们改文章。帮学生修改文章是很苦的事,要顺着他们的思路来改,考虑到学生能够接受,又得到提高。有的是几易其稿才定夺,这比自己写一篇文章要难得多。我指导的博士生毕业之后全都在大学任教。

4

我在山大做过的第三件事,是申报“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项目,帮助山大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一说到学科建设,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科研项目。我对于“项目化”的学术生态是有些抵触的,认为人文学科和理科不同,不能过多预设,也不宜完全依靠定量管理,还是要让学者自由发挥各自的个性与创造性。我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议委员多年,对项目管理的得失还是有所体会的,但也不否认得当的项目研究,可以带动学科的发展。所以到了山大后,也就想到要帮助教研室(研究)的老师申请项目。刚好2012年前后国家社科基金拥有的款项增加了,启动所谓“重大项目”的申报。我就想到不妨试一试申请一个有关“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的大型项目,把现当代连接起来。我的动议得到教研室的一致赞同。我们便讨论了一个申报方案,题目定为《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很快,这个重大项目就顺利通过了。

5

因为是刚开始实施“重大项目”,有上百万元的资助,审批过程很严格。记得“答辩”时,我和叶诚生教授去的,答辩委员七八人,都是文学理论界的著名人物,我都熟悉,但也要认真回答问题。有一位委员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有什么学理根据?一时着急,我还真的回答不上,就说这还只是实践性的设想,希望能通过调查了解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以及文学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状况。其实,我们也是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才逐步形成理论和概念。有惊无险,我们这个项目得以通过。当时,“重大项目”还很少,山大2012年也就申报成功这一个,我们教研室老师都非常兴奋。

之后,我们把项目的宗旨定为:“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

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我们把这个重大项目分为五个子课题,分别由教授带领教研室一些成员(包括北大的)去调查研究;贺仲明主持《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调查》,张颐武和邵燕君主持《网络文学和多媒体文学调查》,郑春主持《当前社会文学生产的实证研究》,张学军主持《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刘方政主持《非主流文学生态研究》。直接参与项目调查研究的有叶诚生、从新强、谢锡文、史建国、马兵、国家玮、程鸿彬、唐锡光、王小舒,等等,有40多人。

到2015年10月,这个项目完成结项,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出版了《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一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还专门发布新闻,在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山大还专门设立了“文学生活馆”(谢锡文和侯淳是主持人),为学校提供一个文学阅读交流的场所,还经常举办面向普通市民的文学讲座。如今山大北门一进去,就看到“文学生活馆”,那个牌子还是我题写的。

我在山大做过的第四件事,就是编写语文教材。我2011年9月到山大,2012年10月,教育部就聘任我为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教材编写比我想象要艰难,各方面都有要求,社会关注度还很高,动辄会引发网上热议,很多精力要做各种平衡、协调和“灭火”的工作。我经常要回北京开会,讨论修改稿子。2016年义务教育的语文教材编完,不想再干了,又经不住教育部再三动员,接着又要编高中语文统编教材。这一干就是11年。一直到2024年春,这项工作还没有完。而山大校方和文学,对我这项工作始终是支持的。杜泽逊教授是很有实力的古文献学家。对他这一行我不熟悉,但很景仰。他参加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等大型古籍的编纂工作,主持过《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五经正义》等古籍的整理,最近又在主持《永乐大典》存卷的综合整理研究,这些都是功德无量的学术工程。杜泽逊教授真是那种把学术当作自己志业的幸福的学人!他的科研任务如此繁重,还能出任文学院长,双肩挑,真不容易。

我在山大做过的第五件事,是帮助山大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都曾在山大(或者前身国立青岛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又有刘洋溪先生开设新文学课程,还专门讲授过“鲁迅研究”,那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后来又有孙昌熙、孔范今、黄万华等先生,在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方面都作出过重大贡献。邀请我去山大,最初也是黄万华与郑春老师他们提议的。

郑春教授的父亲是广东梅县客人,可是不会说客家话。我总想在他魁梧的身上找到某些客家人的“因子”,结果很失望。不过我和他很说得来,他也给我很多帮助,包括生活上的帮助。他在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特别是留学生文化背景的考察方面,有专深的成果。长期担任教学行政工作,对他的专业是有些耽误的。我宽慰他说,学者做教学科研管理,也是一种贡献,应当有成就感。

6

和我交集较多的是黄万华教授,我和他都住南院。深夜,小区安静了,从我的窗口望去,还能见到黄老师住室的灯光。他总是那么辛劳钻研,说他是文学院的“劳动模范”,恰如其分。黄老师当过知青,经历过苦难,后来在泉州华侨大学当老师。也许因为侨乡的缘故,他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业。他做学问很扎实,尽可能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就成年累月浸泡在史料查找中,甚至自费去国外查找资料。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块,黄万华教授掌握的资料最多,也最权威。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老师还未来山大。山大有位老师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有些未找到。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可以找黄万华,他的资料多。这位老师就联系了黄万华,得到帮助。后来山大现当代文学系就决定联系调动黄万华来山大。孔范今教授退休后,黄万华就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和我交集较多的是黄万华教授,我和他都住南院。深夜,小区安静了,从我的窗口望去,还能见到黄老师住室的灯光。他总是那么辛劳钻研,说他是文学院的“劳动模范”,恰如其分。黄老师当过知青,经历过苦难,后来在泉州华侨大学当老师。也许因为侨乡的缘故,他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业。他做学问很扎实,尽可能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就成年累月浸泡在史料查找中,甚至自费去国外查找资料。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块,黄万华教授掌握的资料最多,也最权威。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老师还未来山大。山大有位老师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有些未找到。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可以找黄万华,他的资料多。这位老师就联系了黄万华,得到帮助。后来山大现当代文学系就决定联系调动黄万华来山大。孔范今教授退休后,黄万华就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7

我在山大任教,如果算到现今,已经12年。2011到2015年,我住在济南,在山大南院,也有5年。那时山大全聘任的一级教授有十三位,文学院有盛宁先生和我。可是大多数一级教授都不住在济南,只是有课或有活动时才来学校。而我是搬到此地过日子的。课不多,也较少应酬,那是难得的安宁的日子。至今我还经常想起南院的居家生活,想起闵子骞路的菜摊,想起山大校园的小树林,想起我在知新楼的办公室,想起学人大厦,想起和老师同学一起的那些情景。

很庆幸,到晚年,我生命中还会有山大这一段美丽的经历。

□ 温儒敏

书影

以子为师,敬畏未来

□ 边娟锋

近日,文化学者吴重生教授走进我校报告厅,与数百名家长分享了自己撰写《不畏将来》一书的心路历程。他强调“以子为师,敬畏未来”,是每一位家长的必修课。

听完讲座,我细心拜读了吴教授的心血之作——《不畏将来》。这是一位北大学生家长的教育实践,也是一位中年父亲自我完善的教育探索。

书中有一个故事,当他女儿同时被知名重点中学S校的化学竞赛班和人大附中人文实验班录取时,父母把选择权给了女儿,让她自己选择。读到这里,我的内心十分震惊:如此重要的抉择,怎么可以让刚读初中的女儿独自定夺呢?

看完本书后,我找到了答案——女儿的淡定从容并非一时的“天降如斯也”,而是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在推波助澜,也是父母多年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结果。字里行间,我真切感受到了女儿的独立自主,看到了父母恰到好处的放手和尊重,也体会到了在教育之路上,每一步既平凡,又关键。

吴重生教授的讲座和新书,犹如一道光亮了我,让我的心中充满敬意和感动。

如果这个讲座能让我早六年听到,那该多好啊!我儿子不能再重走一遍小学生活,他曾经的不自信和不够独立,都与我太多的不放心和不放手相关,我对自己“畏将来”的焦虑,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

新书章节《教育家·家·教育》中有一句,“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父母的职能,那种把孩子送到学校或校外培训机构就认为‘万事大吉’的家长,无异于舍本求末”,读到这里,我再次被深深触动——这种家长不就是过去的我吗?

儿子出生于2011年7月,作为已有11教龄的小学语文教师,我认为这个月份出生的孩子注定是“吃亏”,得比较吃力地追赶比他大一岁的孩子。带着“起跑线输了一步”的焦虑,我开始了“拯救儿子”的计划,不停地给儿子报辅导班,激活他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比如锻炼胆识的主持人班、声乐班,还有开发智力的棋类、珠算类培训,再加上必不可少的书写班、网球队。

孩子小小年纪,一踏入小学之门,肩膀上就挑起这么重的担子,性格内敛的他没有怨言,一周七天一直如陀螺般回旋在各种培训班当中。这样的训练,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让他在入学第二个学期就完全赶上了班级进度。儿子一直在我的“计划”中按部就班地长大,但到了小学六年级,他由一个端坐课堂的乖乖仔悄然蜕变为一个上课爱聊天的不安分子,他如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的孙行者,随时都想“逃离”我的手掌心……初一时,当儿子看到我在教育读一年级的妹妹时,他从嘴里蹦出这么一句话:“可怜的妹妹,也开始了我小学所经历的一切,哈哈,我终于摆脱了‘我妈妈是小学老师的阴影’!”

这样的话,当时真的刺痛了我的心,此刻回想,难免汗颜。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次问过儿子,我所安排的一切他到底喜不喜欢,愿不愿意。我堂而皇之地贴上了“培养儿子能力”的标签,有条不紊地做着很多“狠心”的事——让他上太多培训班,童年在疲惫中度过,背上了与年龄不符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曾经的我总为孩子的“慢成长”感到焦虑,从而过度地关注孩子,目光里全是督促、严厉的成分,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情可言,盯得那么紧,压得那么重,管得那么死,剥夺了孩子独立阅读、独自处世的太多时间和空间,灼伤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我强烈感受到——我欠孩子一个太沉太重的“对不起”……

吴教授的教育实践,将很多新鲜的教育理念注入我的心灵深处。

以子为师,敬畏未来。

家长要抱着一颗平和、敬畏的心,平等地跟孩子交流,经常听听他的想法,不要扼杀孩子的天性和主见,因为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成长,能抵抗我们去不了的地方。我们每一次陪伴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制订阅读计划,和孩子一起阅读,不要自己一味地捧着手机刷视频。

面对课务愈发繁重的初中生儿子,如今的我一改以往加压、加码的态度,更多的是一声轻轻的问候或者一句简单的鼓励,甚至是不打扰的态度。在宽松的氛围中,我也和他聊了一些小学时期自己的做法和想法,让他感受到曾经的“虎妈”也在不断地学习和反思,一点点地改变自我,他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我们沟通交流的浅谈深思。

记得去年的第三次月考,儿子从学校400名,一次性越级到学校前45名。我们夫妻俩还有各位任课老师都感到意外,却小心翼翼地反问了一句:“妈妈,这一次我没有让您失望吧?”

“儿子,能做好你自己真好,这次大进步,是你努力的结果和实力的证明,妈妈祝贺你!”

我在惊喜中克制了眼泪的溢出,内心再次为自己过去的错误做法向深受影响的懂事儿子忏悔:我的儿啊,你不要质疑自己,明明你很优秀,却因妈妈的严厉而变得不够自信,其实这么多年,你是多么在乎妈妈的态度啊!

更为惊喜的是,忙于工作的爱人也由小学六年的“空缺管理”开始走进儿子的学习生活,他们一起聊“NBA”,讨论时事政治。当看到他们如朋友兄弟般相处时,我感到并非独自在教养孩子,而是和爱人一起并肩“陪伴”。

吴教授说,人生是一个不断许愿、还愿的过程,父母的支持和身边人的鼓励是孩子圆梦的动力。

相信未来,不畏将来。

居然随风卷了起来,可惜的是,它没有像风滚草那样,在山道上痛快地打几个滚,而是偷偷站起来伸了一下腰,发现有人在偷看,马上又老老实实地躺下了。

小朋友坐在道边的排椅上,边休息边玩手机,我跟他们说,赶快看看脚下有什么?小朋友们看看脚下,又看看我,眼神有点儿茫然,我来不及卖关子了,脱口而出:“快看花瓣,山道上满满地全是花瓣”,小朋友的眼睛瞪大了一圈,果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说:“别说,还真的有点像”,这个说法并不让我感到意外,那颜色便调皮地跑了,只剩下白晃晃的花瓣在慵懒地荡漾。

我用手机,给阳光花瓣拍照,拍全景,拍特写